宝庆讲寺丛书

中国佛教学者文集

朗宇法师　清修法师　主编

印度宗教与佛教

李建欣　著

宗教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印度宗教与佛教/李建欣著. –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3.8

(宝庆讲寺丛书.中国佛教学者文集/朗宇法师、清修法师主编)

ISBN 978–7–80254–739–1

I.①印… II.①李… III.①宗教–印度–文集②佛教–印度–文集 IV.①B928.351–53②B948–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98491 号

印度宗教与佛教

李建欣　著

出版发行: 宗教文化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后海北沿 44 号　(100009)

电　　话: 64095215(发行部)　64095210(编辑部)

策划组稿: 黄夏年

责任编辑: 卫　菲

版式设计: 高秋兰

印　　刷: 北京柯蓝博泰印务有限公司

版权专有　　不得翻印

版本记录: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4 印张　330 千字

2013 年 10 月第 1 版　　201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254–739–1

定　　价: 42.00 元

总　序

从佛法本身来说，教、理、行、证的修学次第，已经为佛弟子指明了修学的道路。但是，佛弟子因为自己的资质、喜好的不同，往往有所偏向，于是形成不同类型的佛法，有重义理、重实践等区别。但是，作为佛弟子来说，义理的探讨是为了将佛陀所要开示的真实事理，充分、完整地表达出来，如“阿毗达摩”虽然着重于论证“法”的自性、定义、关系等，但是其本意仍然在于“谛理的现观”，最终归于修证。那么，重修证的佛教，主要是从利益众生的角度，重视佛法的适应性、实效性，所以对事相的分别比较少，如初期大乘经典以“般若”、“三昧”、“解脱门”、“陀罗尼”、“菩提心”等作为中心，来表达从发趣、修行到证入的历程。虽然存在着种种不同的侧重，但都是佛法的根本，都是以义理知识与实践经验相结合为中心。中国佛教其实已经非常明显地表明了这一点，如天台智者大师的教观并重，这是中国佛教的优良传统。《高僧传》将古代僧人分为十科，其中翻译、解义、读诵便属于义解门；而习禅、明律、感通、遗身、护法、兴福，都是属于实践门；最后一科“杂科”则是指出家人的外学修养，旁及世间经书、治世语言、礼乐

文章等,无不兼通。

但是,传统意义的佛教义解,主要是注疏经、律、论,在“述而不作”中表达自己的理解与观点,当然也有一些专门性的著作。而且,这些佛教义解僧,都是从自己的信仰与经验出发,通过注疏、论著,来达到实践与弘法的目的。南北朝佛教的兴盛、隋唐佛教的辉煌,都与义解的繁荣是分不开的。而禅宗的发展则为中国佛教注入新的生命,重视主体的体认、自己身心的解脱;净土法门的流行,激发了信仰佛教的感情,为佛教走入社会提供了方便。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随着禅、净的流行,在这种“简单”、“不立文字”的潮流下,中国佛教徒逐渐失去探讨高深佛理、考察繁琐戒律的兴趣。于是,中国佛教重视义理研究的优良传统便丧失殆尽。

另一方面,佛学研究在佛教界之外却成为一门世界性的学问。近代意义上的佛学研究,应该是开始于欧洲殖民主义者侵入亚洲地区,殖民者为了维护自己的殖民统治,必须要深入研究亚洲的宗教及其文化。于是,通过接触梵文、巴利文等东方语言,开始了解佛教的理论,消化佛教的教义。在“理性主义”、“科学主义”思想的影响下,这些学者注重现代佛学研究的客观性、纯学术性,形成了佛学研究的现代传统,于是佛教便成为一种学问——佛学。19世纪后期,日本佛教界开始运用西方的学术研究方法,从而推动了日本佛学研究的兴盛与发达。随着“西学东渐”、日本佛教对中国佛教的影响增强,中国开始有了近

代意义上的佛学研究,这在当时中国佛教界引起很大的反响与回应,如《大乘起信论》、《楞严经》的辨伪,“大乘佛教非佛说”的讨论,“佛教非宗教非哲学”之辩等。同时,佛教界受时代流行的学术方法的影响,尤其是以太虚大师为首的“人生佛教”运动,佛教理性主义思想的高扬都直接推动了佛教界从事佛学研究,其中以印顺法师的成就最大。但是,相对来说,学术界则在佛学研究上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像吕澂、陈垣、汤用彤等,皆为一代学术大师。

改革开放后,中国佛教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经过二十年的努力,佛教界基本上完成了修复寺院、重塑佛像的工作,寺院呈现出游人如织、香火旺盛的现象。于是,培养人才、弘法、学术研究等工作提到首要位置。然而,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各方面人才的紧缺无形中遏制中国佛教事业的发展。而人才的成长与培养,这又与佛教界的观念与重视程度是成正比的。

近代佛教学术研究的发展,由于受到欧美治学风气的影响,文献学、考据学、思想史、语言学、社会学、人类学等方法被大量地使用,对佛教进行理性地分析,定性定量,促使人们对佛教认识更加深入。学术研究作为一种工具,用来剖析佛教的历史与思想等等领域,扩大了佛教的知识面,更凸显了佛教的悠久历史和文化积淀。学术研究利用各种先进的研究方法,通过对各种文献的比较研究,不断挖掘利用新出土的资料,显示其优胜之处。通过学术研究,使佛教的思想体系与历史发展脉络更加清楚,提高了

人们对佛法的正确认识。从事学术研究的社会学者本身就是社会的精英,对社会了解非常透彻,其思想观点往往能够补充僧界的不足;同时,他们作为佛教界与社会沟通的桥梁,圆融转化佛教的思想,向社会表达佛教的看法,这些都是有益于社会与众生的活动。

因此,佛教学术研究的根本意义,不仅是了解存在于一定时空中的佛教发展形态,而且更是从现存的文献、文物中,去伪存真,去粗取精,探索其前后延续,彼此关联的因果性;从而更清楚地认识到佛法的本质,及其因时、因地的适应。以了解过去,承受根本的佛法特质,作为我们信行的基础,这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中国佛教协会第七届代表大会便提出要契理契机地弘扬"人间佛教"思想,其中一项重要内容便是"以文化阐扬佛法,佛教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契理契机地以文化阐扬佛法是实现佛教中国化、本土化、现代化的权巧方便。"现代中国佛教界,应该认真地认识学者们的新观点,吸收其中的有用之处,通过转化与变通,仍然能够落实到佛法的信仰与实践,佛教才具有更大的潜力。

宁波宝庆寺始建于北宋端拱二年(989),至今已有千余年的历史。嘉定十五年(1222)宋宁宗赐名"宝庆讲寺"。寺里历代住持及僧众均有重视义理、尊重学术、礼待学人的优良传统,一直讲法不辍。曾在中国历史上流传最广,现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定为世界性启蒙教材《三字经》的作者王应麟曾为宝庆寺撰写了《宝庆讲寺

记》。大儒黄震为寺里撰写了《宝庆寺观音殿记》。此二文的碑刻至今仍然保存完好,高高地耸立在寺里。现在宝庆全寺僧众十分重视自身素质的提高,在日常事务、早晚功课、坐禅念佛等之外,勤于读书,研究经论。我本人自从出家以来,参访名山大寺,受到多位高僧大德善知识的指点,喜欢研读经论及现代学者的研究著作。因此无论到哪里,我都会带上一些书,也经常会到各地的书店去逛逛,看到佛教书籍经过十多年的出版,蔚为大观,感到欣慰。但是,对于社会的需求和佛教文化的发展,目前出版的书籍远远无法满足人们对佛法的需求,而且现有书籍之中,难免良莠不齐,精品佛教图书仍然少见。有感于此,我和道坚法师、圣凯法师、黄夏年先生进行一些交流,得到他们的赞同与支持。于是,我们决定以本寺的名义出版一套丛书,希望能够推进佛学研究的发展,让佛法能够深入社会人心,达到净化人生的效果。

朗　宇

2004 年 6 月 21 日于宁波宝庆讲寺

Contents 目录

001 / 总　序　　朗　宇

论　文

002 / 论印度瑜伽哲学思想的发展
026 / 论印度古典瑜伽哲学中“神”的概念
050 / 论印度古典瑜伽行法
078 / 论印度古典瑜伽的伦理思想
108 / 《奥义书》“梵我合一”思想浅析
128 / 印度耆那教的哲学思想
152 / 佛教在印度兴起的思想文化背景
——沙门思潮论
175 / 中国禅学的印度渊源初论
190 / 佛教与当代西方环境伦理学的对话
202 / 从佛教的处境化视域看都市佛教

215 / 妙峰山彻庸周理禅师论
228 / 从憨山德清的相关著述看伏牛山佛教文化的特色
239 / 楚山绍琦禅师的山居诗简论
258 / 巨赞法师佛教改革思想初探
275 / 比勘会通　玄理参同
——徐梵澄先生学术成就简评
289 / 宗教与世界和平的构建

短　章

308 / 印度圣哲　精神大师
——室利·阿罗频多
320 / 把印度瑜伽介绍到西方的第一人
——著名哲学家辨喜
332 / 宗教与生态
339 / 印度教与生态
346 / 关于宗教与战争的一些思考
351 / 学术园里大榕树
——日本著名学者中村元教授的学术贡献

358 / 宗教史家米亚科·伊里亚德

书　评

372 / 含英咀华　金针度人
——祝贺巫白慧先生《印度哲学》出版
378 / 印度教研究的新创获
——评《印度教:宗教与社会》
386 / 澄辨源流　平章华梵
——《东方佛教论——黄心川佛教文集》简评
391 / 旧译新梓　嘉惠士民
——阿罗频多的《综合瑜伽论》出版有感

附　录

406 / A Comparative Study Between Yoga and Indian Buddhism(印度瑜伽与佛教的比较研究)
427 / 后　记
431 / 《宝庆讲寺丛书——中国佛教学者文集》已出书目

论文

论印度瑜伽哲学思想的发展
论印度古典瑜伽哲学中『神』的概念
论印度古典瑜伽行法
……

论印度瑜伽哲学思想的发展

“瑜伽是梵文 yoga 一词的音译,这个词的词根是 yuj,与英语中的 yoke 同源”①,这个词在印度古代典籍《梨俱吠陀》(Ṛg - veda)中已经多次出现,其意义有多种,如给牛马上驾具、获得神通力、联系等等。其中第一种意义也在以后的吠陀典籍中被广泛运用。“盖自梨俱吠陀以来,宗教苦行(Tapas)或净行(brahmacarya)为人所重。情欲奋发,不可克制,有如劣骑。驾服劣骑,必有技巧。因此瑜伽字原用之于牛马者,乃用之为制服情欲方法之名称。”②

到了印度古文法学家波你尼(Pāṇini)的时代,“瑜伽”一词具有了专门修行方法的意义,波你尼区分了瑜伽的两种意义:一是指三昧行法;一是指联系。在《薄伽梵歌》(Bhagavadgīta)中,我们发现也在这两种意义上使用“瑜伽”一词。当然以后随着人们对瑜伽认识的深入和应用的广泛,瑜伽具有了更

① 黄心川:《印度哲学史》,商务印书馆,1989 年,第 304 页。
② 汤用彤:《印度哲学史略》,中华书局,1960 年,第 105 页。

宽泛的含义,如“联系”、“结合”、“冥想”、“精神统一”等等;随着瑜伽在中国的传播和深入,我国曾把瑜伽译为“道”、“禅”、“相应”等等。波颠阇梨(Patañjali)在《瑜伽经》(Yogasūtra)中把瑜伽定义为“断灭心的作用”①。

由于可资利用的直接资料的缺乏和印度人没有保存下来可靠的历史记载,因此瑜伽发展的历史至今还不大为人所知;我们目前只能依靠一些间接材料将瑜伽发展史大致分为5个时期:(1)原始瑜伽;(2)前古典瑜伽;(3)古典瑜伽;(4)后古典瑜伽;(5)近现代瑜伽。

一、原始瑜伽

关于瑜伽的起源尽管有种种推断,但它在古印度的源远流长是毋庸置疑的:“据印度传说,在距今七千年之前,就有希瓦(Sadshiva)发明秘密(Tantra)瑜伽,流传于喜马拉雅山区。”②如果说上述仅为传说不足为凭的话,下面引用的考古学发现作为现存唯一可靠的证据将向人们证实:瑜伽比现存的出土文物更为古老,在这些雕像和印章之前的很早时期,印度已经形成一整套完备的瑜伽修行体系。“瑜伽的最早遗迹由莫蒂默·威勒爵士(Sir Mortimer Wheeler)于1922年在印度河谷的莫亨约·达罗(Mohenjo-daro)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其中一个上彩釉的印章陶器描绘了一位以莲花式趺坐的男人,两位崇拜者伸展双手立于他的两侧,他们后面是两条高昂着头的蛇。另一块滑石印章也是一男子呈莲花坐姿,只是下面多了一个基座,他旁边有大象、狮子、水牛、犀牛

① 《瑜伽经》1.2。

② 陈兵:《佛教禅学与东方文明》,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2页。

各一头和一对鹿;人有四面,带有头巾。另一个只有上半身,双眼闭合,作冥思状,上衣仅遮一肩,留有胡须和长长的头发。还有一位只是作莲花式而沉思的男子。类似的印章在哈喇帕(Harappa)也多有发掘。这些印章被认为是公元前三千年的。"①

我们注意到这三个印章中的男子都呈莲花坐姿,而"莲花是瑜伽的标志,意思是瑜伽像出水的莲花,永远存在于世界上"②。莲花座是瑜伽行法中最基本的姿势。因此可以确证远在公元前三千年以前古印度就已流行着瑜伽思想和行法了。而且在印度河谷还发现了与苏美尔通商的遗物,由此可以设想瑜伽行法可能传播到现在的伊朗和今天伊拉克所在的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印度河流域文明大约在公元前1500年突然中断,这与越过兴都库什山的雅利安人的入侵有关。雅利安人中流行婆罗门教。他们建立了种姓制度,婆罗门作为祭司为最高,刹帝利作为统治者是第二种姓。其余则处于被统治地位。但在古印度却有一支为数可观的自由思想家队伍游离于当时的社会结构和宗教生活之外,这支独立自由的思想潮流被称为沙门思潮(Sramanism)。在雅利安人把他们自己的吠陀宗教强加给被征服的人们之前,沙门思潮被认为是印度宗教的起源,它比婆罗门教要古老得多,它的代表者是那些分立于婆罗门的吠陀宗教之外并与之对立的各种自由思想家,即瑜伽行者、苦行者、圣者、祖师、流浪哲人、先知或森林哲学家。婆罗门教信奉吠陀天启、祭祀万能、婆罗门至上,他们特别重视宗教仪式,祭祀一直是主要活动。为取悦神,他们不惜以牲畜甚或人作为牺牲。因此大规模地屠宰牲畜被视为当然,宗教仪式中最重要

---

① V. Worthington, *A History of Yoga*, London 1989, p. 11.

② 林中鹏主编《中华气功学》,第265页。

的马祭要持续三周,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劳民伤财。雅利安宗教的残忍性和唯物性与僵死专制的种姓制度使这些自由思想家深恶痛绝,因为他们特别提倡非暴力和不伤害任何生物。他们反对祭祀、卑视吠陀和种姓制度自然不会被握有生杀予夺权力的婆罗门容忍,因此他们到处搜寻、杀害这些自由思想家。为避祸他们远离人群遁入森林,收徒授学,讲道传法。他们的信仰并不相同,有无神论者、有神论者和不可知论者;对轮回和业的信奉程度也不一样。他们的身份不一,有一些人是医治者,另一些人是巫师或通灵的人,但修炼瑜伽像一条红线把他们联系起来,这些自由思想家都实施苦行、冥想、非暴力、瑜伽调息和行法。

除了印度河流域文明出土的文物和历史悠久的民间瑜伽修行者外,原始瑜伽的踪迹还可以在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宗教典籍、婆罗门教的重要经典《吠陀》本集中找到,尤其在《梨俱吠陀》和《阿闼婆吠陀》(Atharva - Veda)中找到。在《梨俱吠陀》中,除了上面提到的 yoga 一词和它的动词词根 yuj 经常出现外,也没有更多直接的瑜伽遗迹。但如果我们把苦行作为瑜伽的最初形态的话,就会发现宗教苦行在《梨俱吠陀》中极受重视;其中在第 10 卷第 190 首诗中,表达了这样的观念:真理和正义,以及包容它们于其中的整个宇宙都由苦行而生;而且早在《梨俱吠陀》时代就有七位圣者(rishi)共同使用了苦行的方法;[①]在天堂的入口处,他们的灵魂听到这样的呼唤:

那些因苦行而(成为)不可战胜的,
靠苦行奋力前进,直达灵光的,
那些实践了最严厉苦行的(灵魂),

① 《梨俱吠陀》x. 109. 4。

天堂之门正是为他们而开![1]

在《梨俱吠陀》第10卷第136首中描绘了一位长发褐衣仙人：临风飘举，驾临诸神曾至的地方。凡俗之人目之所触，皆为其体；而他本人因被赋予神通力，御风而行，与风暴神一起从东西海里狂饮；随风超升，与诸神同高，超越一切形式，与诸神一起为拯救人类而努力。“长发仙人与神灵和万物为伍，能够通达此岸世界与彼岸世界，在他的‘心灵深处’能洞察宇宙万物并拥有主宰万物的力量。”[2]

原始瑜伽时期是根据印度河文明（约公元前3000－1800年）的出土文物和四吠陀中赞歌描写进行推断的；印度河流域的出土文物有力地证明了瑜伽行法在印度的源远流长；《梨俱吠陀》和《阿闼婆吠陀》中的有关描述至少说明了原始瑜伽的一些基本特点：在原始瑜伽时期，瑜伽思想和行法，尚未形成体系；人们要追踪瑜伽在原始时期的表现，只能根据后来已经成熟的瑜伽体系和行法去向古代典籍寻找蛛丝马迹。依此，我们发现瑜伽在原始时期更多地体现为苦行。另外当时的瑜伽和神话传说、人们的巫术实践掺杂在一起，与此相应，人们对瑜伽的重视是因为通过修习瑜伽可以获得神通力。

二、前古典瑜伽

前古典瑜伽自初期奥义书（公元前800年）开始，是指包含在初中期奥义书和印度的伟大史诗《摩诃婆罗多》，尤其是其中的

---

① 《梨俱吠陀》x. 154. 2。

② 转引自黄心川《印度哲学史》，第309页。

《薄伽梵歌》、《解脱法》(Moksha - Dharma)和《续神歌》(Aṇugītā)中的瑜伽思想和行法。这一时期的瑜伽大部分都建立在吠檀多不二论超验哲学基础上,瑜伽的观念和实践在与数论的更紧密的联系中得到发展。因为这些发展大都记录在《摩诃婆罗多》中,所以前古典瑜伽又叫史诗瑜伽。

奥义书的出现是对吠陀"祭祀万能"的反动,它作为天启圣典(shruti),属于智慧方面的,直接与前此吠陀传统的祭祀方面相对立;它们明显背离了古代吠陀所宣称公开的祭祀主义精神,奥义书一开始就试图成为秘密教义,以老师向学生口耳相传的方式进行。它反映了古印度人民开始从神话传说和巫术祭祀的迷雾中走出,从他力到自力,从神话思惟到理性思惟,用他们还稍显稚拙的逻辑思惟来思考"人的本质,世界的根源,人和神、自然的关系,灵魂和肉体的关系,死后的命运等等哲学问题了"①。

作为修行方法的"瑜伽"一词最早出现于《鹧鸪氏奥义》(Taittirīya Upanisaḍ)中,在一个人的修持之中,"信仰为其头,法律为右翼,真理为左翼,瑜伽为躯干,原素为其尾"(2.4)。其后,在《石氏奥义》(Kathaka Upanisaḍ)中更是多次出现瑜伽一词,"当五识和心意停息,思惟不再起动,这才达至高境。此境被称为瑜伽,诸感官被牢牢地抑制住,此时再不分心,瑜伽是其始,也是其终。"(6.10 - 11) 这与《瑜伽经》的看法已比较接近:"制感,使感觉器官与相应的对象分离,置于心的控制之下"(2.54);"执持,使心专注一处,不使驰放"(3.1)。

在同一时期的《白骡奥义》(Śvetāśvatara Upanisaḍ,2.8 - 15)中,瑜伽行法得到系统的阐述:静坐的姿势要胸、颈、头保持一致,

① 黄心川:《印度哲学史》,第52页。

挺直身体,坐姿对称,使意通过各种器官进入心;呼吸的调整要求气息长而细,从鼻孔出入;控制意念要像制服野马一样;静修地点的选择:“一块清洁平整的地方,无火、烟、沙石和水塘,在这里不分心,不刺眼,可避风”(2.10);修行中容易出现雾、烟、太阳、萤光、闪电、水晶、明月等幻相;瑜伽的现实作用是超出生、老、病、死的束缚;瑜伽要达到的最终目的是亲证梵我,获得最后的解脱。瑜伽在此是一种获得解脱的手段。正是在《白骡奥义》中,我们第一次看到禅定瑜伽(dhyāna yoga)和数论瑜伽(Sāṃkhya yoga),通过它们可以认识终极真理。

瑜伽行法在《慈氏奥义》中得到系统的发展,形成了最初的“六支行法”:即调息(Prānāyāma)、制感(Pratyāhāra)、禅定(Dhyāna)、执持(Dhāranā)、思辨(Tarka)、三昧(Samādhi)(6.18);与《瑜伽经》中的“八支行法”相比,我们会发现这里只出现了后五支,而且把禅定放到了执持的前面而不是后面,“八支行法”中第五位(本是禅定的位置)在这里却是思辨(后来在“八支行法”中消失了);无论如何,正是在这“六支行法”的基础上形成了《瑜伽经》中的“八支行法”,不过增加了加强道德修养的禁制、劝制和坐法,去掉了具有抽象思惟功能的思辨,意在强调瑜伽修行中直觉和意志的作用。

在奥义书中,梵我合一是其核心思想,是人的终极信仰,是人生和宇宙的大道,与之相比,瑜伽只是明心见道之术,两者是道与术的关系,而且除了瑜伽之外,弃绝也可以达到解脱,因此瑜伽在奥义书中不占重要地位,它只是作为沙门思想家们和民间人士的修行实践被吸收进来,只有到了《摩诃婆罗多》,尤其是其中的《薄伽梵歌》时,瑜伽才作为主题之一被认真对待,才在圣典之中俨然有一席之地;瑜伽才被宽泛地理解且加以分类、自成系统了。

《薄伽梵歌》提出有三条道路可以达到解脱,即:行为瑜伽(karma yoga)、知识瑜伽(jnāna yoga)和信仰瑜伽(bhakti yoga);前两种瑜伽主要在第一到第十二章得到说明,后一种瑜伽在后六章得到阐明。在第二章后半部分引入了行为瑜伽主题,其中心意思是:根据自己的职责而行动,而不要追求它的结果;专注于自我,漫游于诸根境而不为所动;冥想自我,控制心意,闭锁感官;满足于自我,安住于梵界并且履行自己的职责。在第三章开始便引出了前两种瑜伽:"在此界有两种信仰,很久以前我就将它阐述,一种属于数论派,安那客!它藉知识瑜伽立其足,一种属于瑜伽派,而以行为瑜伽为基础。"(3.3)①至于知识瑜伽和行为瑜伽的关系,"愚夫说数论和瑜伽有别,学者与愚夫则迥然不同,只要正确坚持其一,就能喜获双成。信数论者能达之境,信瑜伽者也能够到达,把数论和瑜伽视为一体,才算是正确的观察。"(5.4-5)

行为瑜伽在《薄伽梵歌》中第一次得到清晰的说明,这种瑜伽可以多种方式进行。正是通过《薄伽梵歌》瑜伽实践才第一次进入日常生活;一种新的瑜伽行法传播开来,这不是奥义书中的传统苦行和冥想的知识瑜伽,而是日常生活中的积极瑜伽;它不是对过去瑜伽实践的扬弃而是补充。修习这种瑜伽的结果是社会的和心理的而不是超自然的。

这一时期的瑜伽从奥义书到《薄伽梵歌》逐步完成了瑜伽行法与吠檀多不二论超验哲学的合一,使瑜伽这一发源于印度原住民、流行于与婆罗门教相对立的沙门思潮中的灵修实践由异端成为正统,由强调行法到行为、信仰、知识三者并行不悖。古典八支

---

① 译文采用张保胜翻译的《薄伽梵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以下不另注。

几乎都先后出现,这已预示着古典瑜伽的形成。

三、古典瑜伽

古典瑜伽(自公元200年始)来源于波颠阇梨的《瑜伽经》,在以后几世纪中随着众多注疏的出现而得到发展;它的哲学基础不再是吠檀多不二论,而是来自于数论的二元论,公开宣称以严格的二元论立场来解释现实。因此古典瑜伽是指由波颠阇梨的《瑜伽经》及其广泛的注解文献发展而成的哲学体系,它又称为"王瑜伽"(rāja yoga),是印度哲学六大古典体系之一。

传统认为金胎(Hiraṇyagarbha)这个神话中的人物是瑜伽的创始人,但却没有文献可以证明这一点;波颠阇梨不是瑜伽的创立者,他只是把在他以前已经存在的关于瑜伽的知识和行法予以系统化,是集其大成者。关于《瑜伽经》的作者波颠阇梨,我们所知不多,西方和印度的许多学者倾向于把他与对古代著名文法学者波你尼(Pāṇini)文典所作注释《大疏》(Mahābhāṣya)的作者看做一人,例如印度达斯古普塔(S. N. Dasgupta)即持此见解,并由此把《瑜伽经》的编写时间推定为公元前2世纪;[①]而美国的伍兹(J. H. Woods)教授却认为并没有确凿的证据可以把两个波颠阇梨混为一谈,从而把《瑜伽经》的编写时间定为公元300-500年之间,[②]这一论断似乎为多数的学者所认可。

波颠阇梨虽然不是瑜伽的首创者,但他在对瑜伽的体系化的努力方面功不可没。他不仅搜集了瑜伽实践的不同形式、网罗了

---

① S. Dasgupta, *A History of Indian Philosophy*, vol. 1, p. 238, Delhi, 1975.

② J. H. Woods, *The Yoga - System of Patanjali or the Ancient Hindu Doctrine of Concentration of Mind*, p. 13 - 19, Harvard Oriental Series, Cambridge, 1927.